

明清經世思想與歷史觀

黃 克 武

一 前 言

明清時代經世思想蔚為風氣，成為一個重要的思想傳統，明末清初的經世思想家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黃宗羲（一六一〇～一六九五）、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等人都致力於檢討當時社會、政治的各種弊端，並進而反省明亡清興的時代變局。入清之後士人的經世傳統並未斷絕，從康熙朝的理學著作到乾嘉時期以考據著稱之學者的文集中，都可以看出其中帶有經世濟民的情懷；而道咸以降今文學家力倡變法，至康梁而達巔峯；不少的古文學家亦肯定由通經而走向致用，進而支持改革活動。「經世」是明清時代多數士人肯定的一個價值取向，它反映出「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並落實為針對現實問題而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

然而經世思想家所關懷的現實問題都有其歷史的淵源，因此「經世」與「歷史」有相當錯綜複雜的關係。對於這個問題的探討可以採取二種不同的角度：

第一個角度是扣緊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所謂：「史學所以經世也，固非空言著述也」，^①探討經世思想家如何透過歷史研究表達其現實的關懷，或如何以歷史知識作為經世的方法。陸寶千先

^①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五」，「浙東學術」。

生所撰「嘉道史學」一文即就此著眼；^②民國七十五年三月清華大學所召開的「中國思想史上的經世傳統」研討會中，更有多篇文章環繞著這個主題，分別探討《左傳》、《通典》、《通志》、《資治通鑑》、《國史大綱》等史書的經世義涵。^③

第二個角度是探討經世思想家的歷史觀 (*perception of history*)，亦即經世思想家所理解的「現實世界的過去情況」。人們對過去的理解是一個主觀選擇和詮釋的過程，經世思想家的歷史觀直接地影響到他的思想體系中目標的設定與手段的採行。以宋代的例子來說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主張以一套高遠的理想徹底改革現實世界，他同意所謂「爲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的看法；而司馬光（一〇一九～一〇八六）則認爲「治天下譬之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他反對復古，只主就漢唐相沿法制，在實際利害上逐步改良。兩人政治觀念的差異，涉及他們對歷史的不同看法。王安石的思想反映出歷史的兩層觀，認爲堯舜三代之治是治世的典型，是道德的實現；而三代以後是治世的消逝，是道德的衰替，因此他以經典的基礎，主張「將唐虞三代來換却秦漢隋唐」。司馬光則不對歷史作黑白式的二分法，他認爲歷史常在演變，三代和秦漢隋唐並沒有本質的差異，因此他並不鄙薄漢唐，也不特別推尊三代，認爲應當針對實際經驗，隨宜因應。南宋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與陳亮（一一四三～一一九四）的辯論也反映不同的歷史觀會有不同的政治理念，朱

② 收入氏著《清代思想史》（臺北：廣文書局，民國七十二年），頁二七七～三二二。

③ 分別是王健文，「禮壞樂崩下的史學與世變——以左傳爲中心的考察」；黃敏枝，「杜佑的經世思想——以《通典》一書爲探討中心」；李弘祺，「鄭樵的經世思想」；黃俊傑，「司馬光經世思想的特質及內涵」；胡昌智，「史學功能在近代的變遷——錢穆《國史大綱》的經世思想」。

熹的看法近於王安石，陳亮的看法則類似司馬光。

本文採取第二種研究角度，希望對明清經世思想與歷史觀之關係作一初步的探討。這個問題牽涉甚廣，目前無法作全面性的檢討，在這篇短文中作者嘗試以鴉片戰爭前夕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所編《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分的史料為例，分析該書的歷史觀，並據以建構一套解釋模型，再抽樣性地選擇較明清時代重要的思想家，探討經世思想中歷史觀的變遷。

二、《文編》學術、治體部分的歷史觀

《皇朝經世文編》由魏源編輯，出版於清道光六年（一八二六），鴉片戰爭爆發前十四年，全書蒐集清初至道光三年以前的文章三千多篇，分為「學術」、「治體」、「吏政」、「戶政」、「禮政」、「兵政」、「刑政」、「工政」等八個部分，其中學術、治體部分討論經世的理論（治道），而後面的六個部分則討論經世的技術（治法）。本節以學術、治體部分的二百九十九篇文章為分析對象，這些文章分屬作者一百四十二人，遍及當時各學術派別，例如明末清初的經世學者顧炎武、黃宗羲；理學家李光地、陸世儀、陸隴其、楊名時、張履祥；古文學者（漢學家）段玉裁、閻若璩、王昶、阮元；今文學者魏源、龔自珍；文學家姚鼐、方苞、惲敬、袁枚；史學家章學誠、王鳴盛、錢大昕、趙翼；此外還有一些不屬於任何派別的一般官吏。由此可見《文編》史料包含廣泛，頗能反映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士人的思想狀況。

本文對《文編》學術、治體部分歷史觀的探討，集中於書中各文對下列三個問題的看法：(1)歷史發展的整體趨勢。(2)王霸之辨。(3)封

建、郡縣之爭。以下分別說明。

(一) 歷史發展的整體趨勢

歸納《文編》學術、治體部分各文章，可以發現當時對於歷史發展的整體趨勢主要有五類意見：第一類意見認為唐、虞、三代（夏、商、周）是理想的黃金時代，三代以後則為不斷墮落的衰頹之世。第二類意見同意上述唐虞三代為黃金時代的看法，但是認為三代以後並非全為衰頹之世，而是有時成功，有時失敗。此外還有一小部分的看法不劃歸以上二類，例如認為歷史是治亂盛衰的循環，對歷史階段的劃分較有彈性（不以三代和三代以來來作區別），以及「道器合一」的歷史觀等，共計五類。

1. 唐虞三代是理想的黃金時代，三代以後為不斷墮落的衰頹之世。

這種看法在傳統儒家思想中居於主流地位，可以稱之為「三代史觀」，《文編》中在這方面的意見很多，^④綜合書中的資料可知他們認為歷史可以很清楚地區分為兩個階段。

^④ 《文編》中的意見如下表，出處部分的數字依次代表書中的卷數和頁數。

	三 代	三 代 以 下	出 處
1.	王道	霸道	俞長城，七，一上。
2.	三代之治天下以道，其道具，其器備。 古者治天下之大器有三，曰封建，曰井田，曰學校。	三代後之治天下也以術，其道微，其器亡也。 繼三代而為治者，封建廢，郡縣興，舉古所謂考體正刑一德之治，變為簿書算數，遂以吏胥而操官府之柄…… 井田廢，兼併興，舉古所謂保受葬救賬賓之治，變為	汪續，一，七上——下。

		傭徒市隸，遂以富民得制貧民之命……。學校廢，制科興，舉古所謂升之司徒詔之樂正者，變爲有司之程尺，遂以空言而獲倖進矣……。	
3.	唐虞三代之盛，所以廉政畢修，民生克遂，而登上理……古帝王爲治之本，無過內治之心，而治心之要，無過吾心之仁。		繆彤，七，十一上。
4.	夫舜豈教逸欲而好怠荒者哉，而諸臣言之而不以爲忤，帝舜受之而不以爲非，古大臣之愛其君，與君之自愛，其慎微防患，保泰持盈之至意，不得不如此也，有虞氏之治，所以弗可及，而君道臣道，爲千古人倫之至者，在是也。	前代有爲之主，始以德義爲心，惟恐人之不言，每曲導之使言，繼則聞人之言悅之而已，不必其盡從也，久則恐人之言，言之而不必受，受之而亦有難色，又其甚者，或引之於當道，輒自以爲已知，或格其心之非，輒自以爲無失。	楊椿，十，一下，二上。
5.	憂民憂，樂民樂，王道終始之大端也，唐虞三代之憂樂其民者，詩書可考也。	後之不能爲唐虞三代也，固然也，無憂樂乎民之心也。	汪縉，一，六上。
6.	三代以官爲治事之司，故其制簡而清。	後世以官爲賞人之物，故其制繁而亂。	陸世儀，十三，十上。
7.	教養萬民。	後世但聞取民。	同右。
8.	三代以上，開誠布公，主於用君子。	三代以後，禁制束數主於小人。	陸世儀，十三，八下。
9.	三代以上之人才由於教化……由於教化者遞衍爲無窮。	三代以下之人才乘乎氣運……乘乎氣運者一發而易竭，必也以教化挽回之。	蔣伊，十，二十下。
10.	帝王之道，中而已矣，惟中故緩獄措刑而不厭其寬，詰茲除暴而不厭其嚴，治具織也，	漢唐宋之所以有古治遺意者，則以其寬嚴煩簡偶合於中也，其所以不如三代者，則	陸隨其，十一，一上。

- | | | | |
|-----|--|--|----------------|
| | 悉而不厭其煩，獨持大體而
不厭其簡，此唐虞三代之治
，所以萬世莫與京也。 | 以合而有未盡合也。 | |
| 11. | 古之所謂財，布帛菽粟而已
，皆產於地而出於農。 | 今不重布帛菽粟而重金錢，
農夫紅女，終歲勤勞，而所
獲或不易一握，此一握之物
，又寒不可衣，饑不可食，
而無之卽無以應官吏而行交
際。 | 錢維城，十一
，三下。 |
| | 古者計田授田，一夫百畝，
其貧富之分，不過地有肥磽
，人力有強弱勤惰，蓋無大
相懸絕者也。 | 今則不然，富者田連阡陌，
而貧者或無立錐，農夫受其
田而耕之，役使如奴隸，豪
商大賈，狹其金錢，買賤賣
貴，子母相權，歲入或數萬
金。 | |
| 12. | 自黃帝堯舜至周之中葉，僅
二千年，其民繁祉老壽，恒
數百年不見兵革，雖更姓易
代，而禍不延於民。 | 降及春秋，脊脊大亂，尙賴
先生之道澤，以相維持，會
盟討伐徵辭執禮，且其時戰
必以車，而長兵不過弓矢，
所謂敗績，師徒奔潰而已，
其俘獲至千百人，則傳必書
，以爲大酷焉。
自戰國至元明，亦二千年，
無數十年而無小變，百年二
百年而不驅至於大亂者，兵
禍之連，動數十百年，殺人
之多，每數十百萬。 | 方苞，四，四
上。 |
| 13. | 以九職任萬民……當其時內
外男女，各修其職，各安其
分，而又錦繡珠玉，不粥於不日弊，民安得不日窮哉。
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民生不見奢侈之可慕，而左
道亂政者殺，又無妖淫邪誕 | 後世王政不講，於民聽其自
息自耗自富自貧……俗安得
任啓運，十
十三下，十四
上。 | |

	之說，鼓惑其間，以故太和 洋溢，疾不生。		
14.	三代而上有學而無術，而放 桀遷桐居東討叔，皆自然之 窾曲，曲折赴之，以無失天 理之正。	戰國以暨後世之偽儒，則有 術而無學，堯舜亦世事之名 ，沿緣已私以入國僥倖，雖 至於殺身而不悔。	彭士望，二， 十上。
15.	君子之學必好問也問與學相 輔而行者也，非學無以致疑 ，非問無以廣識……古之人 虛中樂善，不擇事而問焉， 不擇人而問焉，取其有益於 身而已。	三代而下有學而無問……學 之所以不能幾於古者，非此 之由乎？	劉開，六，二 上。
16.	秦以上之言如燭肉……雖少 也，重於鈞金。	唐以下之文如菜羹……雖多 也，輕於車羽。	唐甄，五，八 下。
17.	經稟聖裁，垂型萬世。	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 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 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詰 順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 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 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 王肅，稍持異議……及其弊 也雜；洛閩繼起，道學大昌 ……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 也悍；學脈旁分，攀緣日衆 ……其學見異不遷，及其敝 也黨；……自明正德嘉靖以 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 也肆；……國初諸家，其學 徵實不諱，及其弊也瑣。	四庫全書提要 ，五，一下。

唐虞三代是理想的黃金時代，是王道的實現。政治方面：君主行仁政、納諫；實行封建制度，以「禮」來維繫整體的政治社會秩序；任用君子的治事之才；刑罰恰當適宜，合乎中道。經濟方面：實行井田制度，計口授田，為民置產，因此財富平均。教育方面：以學校制度教化人民。社會方面：沒有天災和人禍，也沒有放蕩妖淫的邪說，人民安居樂業，風俗淳樸。知識方面：當時的文章數目不多，但是字字珠璣，尤其是經典之中蘊含了絕對的智慧；人們在追求知識時態度誠懇，學與問並重。

三代以後則為不斷墮落的衰頹之世，是為霸道。政治方面：君主不關懷民生痛苦，又不願接受臣下的諫諍；實行郡縣制度，禮制破壞，胥吏弄權；任用小人，以官位為賞賜之物；刑罰偶爾合于中道，多數有所偏頗。經濟方面：國家只知征斂，却不知為民置產，由於土地私有可以自由買賣，出現了土地兼併，並造成貧富不均。教育方面：學校制度廢棄，科舉制度興起，國家不重視人才的培育，依靠虛文即可倖進。社會方面：天災人禍不斷、妖言競出、民生困窮、風俗敗壞。知識方面：文章數目雖多却內容貧乏，同時各時代的經學研究都有弊端，人們追求知識時只知學而不知問。

總之，三代和三代以後的兩個階段截然相對、黑白分明。而兩個階段之間轉變的關鍵點也很清楚，有人認為是商鞅、李斯，也有人認為是周宣、秦穆之際：

三代之器至於澌滅無遺者，以秦之得志于天下，商鞅之言用于前，李斯之言踵於後……鞅斯之言得見用於秦者，是又古今一大消長之樞也。（汪縉，一，七下）

予嘗謂三代以前無霸，三代以後無王……故尚書錄秦穆，誌秦興也，國語遡宣王，誌周衰也，周宣秦穆其王霸升降之會乎。

(俞長城，七，一下)

大致而言他們認為秦行法家治術之後，歷史的發展有如從山頂墜入萬仞深淵。

「三代史觀」中黃金時代在古代而不在未來，因此有「今不如古」的看法，在三代理想的對照下三代以後顯得每況愈下，而當代正處每況愈下的最低潮。這種看法與近代西方思想中的「進步史觀」有明顯的不同，「進步史觀」認為人類歷史不斷進步，後代必然超過前代，只要人類運用理性力量，不久的將來可以在現實世界中建立俗世的天堂，因此不必期望來世的得救，「進步史觀」將黃金時代由古代轉移到未來，對西洋近代歷史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相對而言，「三代史觀」缺乏這種「人類未來會不斷進步的信念」。但是「三代史觀」也絕非全無現實的意義，由於三代理想的存在，使中國知識份子在超越理想與現實世界之間存著一種高度的緊張關係，因而激發出以三代理想批判現實政治的精神，這種批判精神無疑地也是促成現實世界不斷改進的重要力量。

2. 同意三代是理想的黃金時代，但是認為三代以後並非全為衰頹之世，而是有時成功，有時失敗。

這種看法與上述看法最大的不同在於它肯定了三代以後的某些成就，下面是《文編》中一部分的看法。例如認為漢唐宋明之英君氣象近乎三代聖王：

蓋為天下君而不自利於己，莫非王臣而不視為私屬，可大可久，王道之至極也；三代以下，若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宋之仁宗，皆能合四海為一家，聯兆姓為一體，其於爻所陳弗損之規模，獲益之氣象，殆庶幾乎。（趙青藜，十，六下）

封建之天下，非堯舜禹治文武之聖，不足以懷服，郡縣之天

下，漢唐宋元明之英君懿辟，一人獨運於上，公卿大夫士承流於下，民未嘗不獲安，天爲是雖不生堯舜禹湯文武，而天下已治矣。（劉鴻翹，十一，六下）

漢代的教育與選舉制度，以及唐宋的良師成就可觀：

古之學者，文事武備，未嘗不兼……故文武惟其所用，公卿即爲將帥，沿至兩漢此風未泯，刺史守令多能以武節著，保障一方，不煩徵調，則猶先王之遺澤也，科舉之學興，士專於揣摩剿說，讀經輒從刪削，經義尤多假借，而實學微矣。（齊召南，十，十九上）

漢崇經術，尚吏治，舉士必問鄉評，入官必試實跡，故通春秋即可以決獄，通尚書即可以治河……漢之學者通一經可以用之終身，後之學者，通五經不能見諸一事……且唐宋非無人也，陽城爲師，而世奮於忠孝，胡瑗爲師，而士習於經義，其明效大驗，亦可覩已。（夏之蓉，十，二十一上）

各代的賢臣勳業燦然：

管仲霸之始，王道所由絕也，而吾謂欲復王道必自管仲始，……吾於伊周而後，所深好篤嗜者，莫如管仲，其次則漢之諸葛武侯，唐之狄梁公，李鄆侯、陸宣公，宋之韓魏公、李忠定公，明之于忠肅公、王文成公。其人皆具旋乾轉坤之力。（任啓運，十一，三下）。

漢之諸葛亮、唐之陸贊，夫未嘗希高慕遠也，其事君也，口不必堯舜，其處身也，口不必曰伊周，其勤恤民隱之心，即堯舜其君，伊周其身者，不之過也。（汪縉，一，六下）

孔顏曾孟而後，周程張朱以前，此千餘年間道統幾絕，所謂名臣大儒者，勳業文章，非無爛然，類皆雜於功名之私，其粹然

一出於正，而能以道事君者唯忠宣（陸贊）。其庶幾乎。（沈近思，十四，三上）

大人之容物愛物也，廣言之則更僕未易數，約言之則以培護人才，薦引士類爲容物愛物之本，不暇遠引，請引宋明以來諸宰執證之，人物莫盛於宋，宰相之賢亦莫盛於宋，然嘗謂宋有宰執三人焉，寇忠愍、范文正、歐陽文忠而已……明季諸相，皆齷齪無遠略……惟江陵當國，於戚繼光、李成梁諸將知之而用之，用之而盡，蓋猶有忠愍、文正遺略焉。（儲大文，十四，一下～二上）

唐宋的儒者值得效法：

六經同體而異用，文中子因其用而識其體，識其體而達諸用。其述易也，於運行之智，有以知其時；其述書也，於變化之制有以識其中；其述詩也，於興衰之由，有以得其要；其述體也，於三才之接，有以達其奧；其述樂也，於九變之治，有以觀其成；其述春秋也，於王道之輕重曲直，有以取其衷。（汪縉，十一，十一上）

夫古人爲學，皆以自治其身心，而以應天下國家之事，故處則爲大儒，出則爲大臣，未有剖事與心爲二，剖學與行爲二者也，由漢及唐，孔孟之真傳不顯，而其學行默與古合者，亦代不乏人，及宋賢出，而修己治人之法，程功進序之方，燦然大明，毫釐不爽，程朱諸儒，亦旣小試之而事無不治，自是而降，守其教者四百年，志節功行，先後相忘，雖其末流亦往往有迂拘濡緩之弊，則學而不及者之過，非前人立教者之過也。（程晉芳，三，三下～三上）

古之經術治術無別也，自六經中厄於秦火，漢儒掎摭掇拾于

煨燼中，爲之箋解訓故，貫串鉤穴，功亦可爲鉅矣……而缺略放軼，不能盡悉聖人之道之所以大，於時爲管商申韓鄧析子之學者，遂得竊起持政事之柄，而經生僅僅守其空文以相號召，經與事遂判然爲二……宋胡氏瑗憂之，因分經義治事爲二，各因質所近，以教授諸弟子，其後用之于世，莫不班班然有成效可紀，夫胡氏治事，粹然一出于正，盡掃管商申韓鄧析刑名法家之積習，使學者知王道所本，洵可爲造士者法矣。（王昶，一，十四上）

從上述資料，我們發現這一類意見認爲歷展的趨勢大致有四個重要的階段：

- (1)唐虞三代爲理想的黃金時代。
- (2)自周代末年發生一件關鍵性的事情之後（如秦火或法家思想的出現）開始衰弱。
- (3)春秋、漢代、唐代、宋代或明代有一些成功的例子，他們的成功可以媲美三代時的部分理想。
- (4)在此之後又有衰世。

大致而言上述四個發展階段是他們共同的意見，其中(1)(2)(4)三階段的看法多數人都相同，只有第(3)階段有關三代以後成功的例子，各人則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下列幾項：

- (1)春秋時代成功的例子：管仲。
- (2)漢代成功的例子：知識份子通經致用的精神、文武合一的教育制度、以及人物方面的漢文帝和諸葛亮。
- (3)隋唐時代成功的例子：唐太宗、陸贊、狄仁傑、李泌、王通、陽城等人。
- (4)宋代成功的例子：宋仁宗、程朱諸儒、胡瑗、寇準、韓琦、范仲淹、歐陽修、李綱等人。

(5) 明代成功的例子：王守仁、于謙、張居正等人。

上述各項的例子雖然並不完備，但是我們可以發現當時的知識份子已經逐漸在三代以後的歷史中找到另一些理想。這些理想在時間上與當代較為接近，在性質上雖然不一定是十全十美，却足為當代楷模。本文不擬詳論每一個例子的內容，不過大體而言，漢文帝受推崇是由於具有「慄慄危懼之心」、唐太宗受推崇是由於納諫，漢代通經致用的精神與胡瑗經義治事合一的教育則同樣是由於知識與事功貫通的理想。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文編》中特別肯定管仲、諸葛亮與張居正。上述任啓運的文章大力推崇管仲，認為他是由王道轉入霸道的關鍵，故應先效法管仲的政法，才有機會返回王道。其次深受各文推崇的是諸葛亮，在學術、治體部分各文中提及諸葛亮的次數超過十次，認為他「開誠布公」、「虛己下問」、「澹泊明志」、「賞罰嚴明」、「追求實效」等等，我們發現所有的人都肯定他的成就；至於張居正，除了以上的引文，《文編》還收有林潞的「江陵救時之相論」，文中雖然對於「逐新鄭、廢遼王、奪情起復」三事有所不滿，但是全文都積極地肯定張居正的貢獻，並將他推崇為救時之相。在傳統思想中孔子曾推崇管仲，但多數人均將之視為法家的代表人物；至於諸葛亮和張居正則常因重賞罰與實效而被指責為「不是純粹的儒者」。《文編》對上述三人的推崇顯示出《文編》經世思想的特殊傾向。其次這類意見都認為當代是一個衰弱的時代，我們也發現三代以後的理想中明清時代的例子極少，這種現象似乎顯示他們雖然肯定了一些三代以後的理想，但是仍然認為理想與現實在時間與空間上仍有一段差距。

3. 歷史是治亂盛衰的循環，三代和三代以後都是如此。例如：

凡程子所指二者之弊，自三代以至漢唐宋元明，盛極而衰，

罔不由此。（陶貞一，十，五上）

……因思古來，當去樸之時，必有二三君子，留其樸以還天地，使絲續於後，故一代有一代之盤古、中古、叔季，叔季復爲盤古，理固然也。（魏禮，四，三上）

三代以後，開國之初，戡亂致治之佐，皆敦樸厚重，思深而慮遠，足以歷數百年之規模，此非教化所致也，氣運隆則人才與俱隆焉，及其耗也，文恬武熙，跪隨容悅以竊祿而已，甚至背公植黨，角立爭勝，雖有願治之主，而國事靡所與屬。蓋觀於唐宋明之季年，可惟長太息者矣！……說者謂三代之君，能守其祖宗之法，雖至今存可也。（程夢星，十，六上）

上述的看法可以稱爲「歷史循環論」，它的理論基礎是所謂「物極必反」的原則。在中國思想史上至少可以追溯到《易經》「否極泰來」、「剝極而復」的觀念。然而最耳熟能詳的例子則爲《孟子》「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至宋儒邵雍發展出一套可能是中國思想史上最詳密的系統，它不只涵蓋了人類的循環也涵蓋了宇宙的循環，循環的周期長達十二萬九千六百年。^⑤《文編》中「歷史循環論」的例子並不多，看法也不夠精密，大致而言書中認爲人事的治亂盛衰決定於氣的自然運行，氣運隆盛則爲治世，氣運衰竭則爲亂世。人爲努力對歷史發展的影響十分有限。

4. 對歷史階段的劃分較富彈性。有下面三個例子：

古今文章，代有不同，而其大變有二，自唐虞至於兩漢，此與世運遞降者也；自魏晉以迄於今，此不與世運遞降者也。三代

^⑤ 參考楊聯陞，「國史諸朝興衰芻論」，收入《國史探微》（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二年），頁三六～三七。

之文不如唐虞，秦漢之文不如三代……魏晉以來，其文靡弱，至隋唐而極，而韓愈李翱諸人，崛起八代以後，有以振之，天下翕然敦古，梁唐以來，無文章矣，而歐蘇諸人，崛起六代之後，古學於是復振。（魏禧，五，十二下～十三上）

天下之風俗，代有所敝，夏人尚忠，其敝爲野，殷人尚敬，其敝爲鬼，周人尚文，其敝也文勝而人逐末。三代已然，況後世乎，雖然，承其敝而善矯之，此三代兩漢俗之所以日美也，承其敝而不善矯之，此秦人魏晉梁陳，俗之所以日頽也。（管同，七，十五上）

太上養欲，其次同欲，其下獨欲，獨欲者，秦是也，同欲者，順人之欲以遂己之欲者也，三代之賢君，漢唐之治主是也。……必有養欲之主，而後禮教明，必有寡欲無欲之主，而後養欲之治修，養欲之治修，而後倫理得，天下肥，是謂大順，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汪縉，一，九上）

第一個例子認為文章的演變從唐虞至兩漢逐漸衰弱，一代不如一代，魏晉以後則爲盛衰的循環，這種看法結合了前述的意見，以兩漢爲分界點，前半段類似三代史觀，後半段則爲歷史循環論。第二個例子認爲歷代風俗「代有所敝」，似乎表示三代和三代以後都是有好有壞，但接下來又推論出另一種看法認爲三代和兩漢「承其敝而善矯之」，所以風俗日美，秦、魏、晉、梁、陳等朝代「承其敝而不善矯之」，所以風俗日頽，這種看法將三代與兩漢並論，類似第二類意見，但說法較複雜。第三個例子劃分歷代君主的等級，認爲堯舜禹湯文武爲養欲之君，三代之賢君和漢唐之治主是同欲之君，秦則代表獨欲之君，其中把三代賢君和漢唐治主並列，由此亦透露作者認爲三代有不賢之君，而漢唐也有不治之主，因此堯舜禹湯文武之時爲黃金時

代，在此以後則有時成功有時失敗。這種看法與第二類意見大體相同，只是黃金時代的時間較短。上述三個例子顯示他們對歷史階段的劃分較富彈性。

5. 道器合一的歷史觀，這種看法認為歷史是一個人世演變遞嬗的客觀趨勢，其中蘊含著「道」，類似王夫之「理勢合一」或章學誠所謂「道在史中」的看法。「道器合一」的歷史觀在明代後期以來即甚為常見，但《文編》中這方面的資料不多，例如彭士望認為：

大之貫穿數千年之成事，包六合之內外，細則敝屬敗縕，啜菽飲水，食豕祝雞，一瞬一息，一顰一笑，皆有皇帝王伯之故，相取于無窮。（彭士望，二，十下）

魏源在《文編》的敍文中也有類似的意見：

人積人之謂治，治相嬗成今古，有洿隆有敝更之謂器與道。君公卿士庶人推本今世前世道器之洿隆所由然，以自治外治，知違從，知伍參變化之謂學。學爲師長、學爲臣、學爲士庶者也，格其身心家國之物，知奚以正奚以修奚以齊且治平者也。

前一段的引文認為在日常事物之中藏有最根本的「皇帝王伯之故」；魏源則更直接地表示「道器合一」，從歷史的興衰得失中可以明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這種看法打破了「三代史觀」的歷史二元論，否認「道」只在三代的看法，認為從歷史長期發展、客觀演進的過程中也可以知「道」。

綜合以上的討論我們發現：

1. 鴉片戰爭之前經世思想家對歷史發展整體趨勢之看法較為複雜，至少可以細分為上述五點的意見，並非所有人都無條件地接受「三代史觀」或「歷史循環論」。上述第二類意見顯示他們已修正了三代史觀，而在三代以後的歷史中另建理想；而「對歷史劃分較有彈

性」以及「道器合一的歷史觀」等看法則顯示「三代史觀」並非教條，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心得揉合舊說或另創新說。

2. 上述五種看法有時不是界線清楚而絕對互斥的，在《文編》史料中可以發現，同一位作者在不同文章中可能表達出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看法，這種不一致的情形顯示經世思想中歷史觀的複雜性。

3. 就數量上而言第一和第二類意見最多，因此我們可以說大多數知識份子都接受三代是理想的黃金時代，只是其中有一部分的人強調三代以後不斷地衰弱，因此他們的目標是超越漢唐霸道、返回三代王道，而採行的方法則是三代的良法多意；另一部分的人則認為三代以後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值得效法，因此他們的目標是漢、唐、宋、明等朝的楷模，先達到這個目標，將來有機會再返回三代的王道。這些看法牽涉到下面要討論的「王霸之辨」和「封建、郡縣之爭」的問題。

(二) 王霸之辨

王霸之辨是中國思想史上的老問題，孔子並未揭出王霸之別，孟子則明辨王與霸，指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公孫丑」），兩者有本質的不同，不可混淆；荀子的看法與孟子頗有出入，他認為：

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與積禮義之君子爲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爲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亡。（「王霸」）

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存亡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并之心。（「王制」）

可見荀子認為王霸之間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只是成就上的等級差異，所以他對霸的評估並不帶譴責的意味。

宋代王霸之辨成爲儒者關心的大問題，王安石與司馬光也有截然不同的見解。王安石的看法與孟子類似，司馬光則較接近荀子。司馬光認爲王霸無異道，只是德澤深淺與功業鉅細的區別；王安石則主張王霸是存心的不同，「其心異則事異，其事異則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這種看法撇開政治而逕論爲政者的心術，王霸之辨是義利之辨，兩者有本質上的不同。

由上述的討論可知王霸之辨基本上是一種政體劃分與政治評估，但和歷史觀合在一起則成爲歷史評估，並反映其政治理想之所在。故孟子和王安石皆認爲三代是王道，三代以後是霸道，力主取法三代的王道，倡言復古。司馬光則以王霸爲等級性的不同，漢唐功業有其價值，足資效法。

《文編》中討論王霸問題的文章主要有俞長城的「王霸辨」和任啓運的「管仲論」兩篇。^⑥

「王霸論」一文認爲王霸之辨在於存心，不在制度或事功，君心正則王，君心不正則霸，在歷史上：

三代以前無霸，三代以後無王，桓文霸也，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亦霸也。……人言漢高不事詩書而霸，然光武投戈獎藝而亦霸；唐太宗閨門不肅而霸，然明太祖修女誠嚴官政而亦霸；宋太祖乘勢窃位而霸，然昭烈帝仗義討賊而亦霸。關鍵即在君主的存心，作者並以水來作比喻，認爲王道有如黃河「達乎九州而放乎四海」，「其出無窮而其流不息」，因爲它有一個根本的源頭；霸道則有如七、八月之間的豪雨，「來易盈而去易竭」。而所謂王道之本是指：

⑥ 「王霸辨」見《文編》，卷七，頁一上——二上；「管仲論」見《文編》，卷十一，頁二下——三上。

治顯者自微始，治外在自內始；治疏者自親始，治遠者自近始，明此而王道之本可知矣。

因此實行王道的關鍵是爲政者的正心、修身，而非實施三代的封建、井田、學校等制，所以作者指出：

夫周官者古今治法之全也，然周公制之以治周則王，管仲變之以治齊則霸，商鞅廢之以治秦則強，王安石復之以治宋則亂，豈其法之有異哉，心之有不同也。

君心正則雖節目疏闊，不害其爲王，君心不正則雖治具畢張，不免于爲霸。

因此作者力主以王道爲理想而不以霸道爲目標，因爲霸道「善自外入，不自中生，故勢不可久也」，例如：

唐太宗始用魏徵，既死而仆其碑；明神宗師事張居正，旋籍滅其產，豈始明而終暗哉，亦以心本不正，特勉強以從之耳。只要君主存著誠敬之心，然後推之天下，則「禮樂刑政，莫不畢舉，而王道四達」。

總之「王霸辨」一文認爲王與霸的區別是本質上的不同，而不是程度上的差異，而其關鍵在於君主的存心，並非法制，作者認爲只要君主能有善良的動機（心正），則健全的制度隨之產生，並能返回三代的王道；如果君王不具有善良的動機（心不正）則爲霸道，即使有所作爲也只是表面工作，終究無法長久。這種看法基本上仍是襲自大學所謂由「格致減正」推向「修齊治平」以及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的主張。

王不任啓運「管仲論」一文與上述的看法有所不同，作者仍然肯定唐虞三代是王道，而三代以後是霸道的歷史評價。但他特別指出管仲居於由王到霸的轉捩點，因此想要恢復王道必須先回復到管仲的霸道：

今有人焉自崖而墜萬仞之淵，其所由起者，必其所從墜之崖。自中華而適荒外，其所由反者，必其所從出之塞也。管仲者王道所從墜之崖，伯功所從入之途也。故吾謂欲復唐虞三代之王道必自管仲始。

作者以爲管仲繼承了「禹湯文武之遺」，故其功業可以比擬三代政法：

仲之存邢封衛，何異於武王之興滅繼絕；仲之連鄉軌里，何異於周禮之井邑乘邱；鄉長三選，何異於鄉舉里選哉。

前文曾提及作者認爲管仲之後的諸葛亮、狄仁傑、李泌、陸贊、韓琦、李綱、于謙、王守仁皆具旋乾轉坤之力，主要即因爲他們能了解管仲之政法：

武侯固以管仲自比，其實狄梁公以下諸賢，其經世之學皆深於仲者也。

因此他批評當代儒者鄙薄管仲，並認爲應先以管仲的霸道爲目標，將來才有機會返回三代的王道：

今之儒者，概以孟子卑仲，遂并仲所承禹湯文武之法，盡棄而不道。嗚呼！此其所以終古不反者歟。（任啓運，十一，三上）

「管仲論」一文表面上仍以王霸如山崖與深淵之別，但他却肯定管仲的霸業，並認爲管仲的政法承襲禹湯文武，可與王道相通，這種看法已使王霸的區別由性質的不同轉變爲等級性的差異。

比較「王霸辨」與「管仲論」可以發現兩者對王霸問題的構想並不一致。在事實判斷的層面兩文均同意三代以上是王道，三代以後是霸道。但在價值判斷的層面，「王霸辨」主張應以王道爲理想而不應以霸道爲目標，王霸猶如黑白，所以採行王道則天下大治，運用霸道則必將陷入失敗，而王與霸的劃分在於君主的存心不在法制，所以實

現王道的方法是君主的正心、修身，並逐步推廣到家國天下，不必實行三代的封建、井田、學校等制度。「管仲論」則肯定管仲之霸道，認為王道是終極的目標，但目前無法直接返回王道，故先行管仲的霸道，實現之後可再進一步恢復王道，因此他主張應由目前的衰微狀況進步到霸道，再由霸道進步到王道，整個發展是一個階梯性的上升過程，王道與霸道並不衝突。

(三) 封建郡縣之爭

封建、郡縣是指兩種政府組織的形式。封建制度的基本精神是地方分權，意指由君主分封或承認一些封國，並給予其統治者世襲的地位；郡縣制度的基本精神則為中央集權，是將帝國劃分成若干郡與縣，由中央政府任命郡守和縣令來治理，這些官員各有固定任期。早在秦漢時代封建與郡縣的問題就迭有爭辯，唐宋以降討論甚多，主張郡縣制度的學者有杜佑（死於八一二年）、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蘇軾（一〇三六～一一〇一）等，其中柳宗元的「封建論」一文尤其重要。擁護封建制度的學者陣容也很難堅強，有張載（一〇二〇～一〇七七）、胡五峯（一一〇〇～一一五五）、吳萊（一二九七～一三四〇），明代則有黃宗羲和顧炎武。封建制度不是單獨存在的政治制度，它和經濟方面的井田制度和教育方面的學校制度配合在一起，因此在此處一併討論當時學者對井田學校等問題的看法。

《文編》對封建、郡縣問題的討論亦涉及二個不同的層次，一個是歷史的過程是什麼？一個是應該採取什麼制度？學術、治體部分對此問題討論得最詳細的是汪縉的「準孟」一文。^⑦

作者認為三代時治理天下的「大器」有三，即封建、井田和學校。封建可以制爵制祿，井田可以任地任民，而學校則可以明人倫；

^⑦ 見《文編》，卷一，頁七上——八下。

三者的配合使三代成為一個以「禮」為中心的理想社會。然而秦以後重用商鞅、李斯使「三代之器至于澌滅無遺」，結果天下大亂：

封建廢，郡縣興，舉古所謂考禮正刑一德之治，變為籌書算數，遂以胥吏得操官府之柄……井田廢，兼併興，舉古所謂保受葬救賙賓之治，變為傭徒市韓，遂以富民得制貧民之命……學校廢，制科興，舉古所謂升之司徒詔之樂正者，變為有司之程尺，遂以空言而獲倖進。

在法家思想盛行之下，孟子的主張不為人所重視，孟子的理想是維持三代的封建、井田、學校。作者認為孟子之道不行而鞅斯之言却為秦所重用，此乃「古今一大消長之樞」。他並思考孟子之道衰微與鞅斯之說盛行的原因，他認為三代有道有器，道如規矩，器則如規矩所畫出的方圓，「天下有不弊之道，無不弊之器」，器既然會壞，因此至周朝末年，三代的封建、井田、學校「有必消之勢焉」：

封建者所以明君臣之分也，自爭奪起，篡弑作而君臣之禍亟矣，此封建必消之勢也。井田者所以均民地之數也，自侵暴興，經界亂而民地之律紊矣，此井田必消之勢也。學校者所以養賢才之具也，自學術壞，橫議生而賢材之敗極矣，此學校必消之勢也。

三代之器既然泯滅，所以後代君主始終無法將之恢復。但作者進一步指出三代之器雖然泯滅，三代之道却並沒有喪亡，最後他提出結論，建議治理天下的君主只要掌握三代之道，不必強行恢復三代之器，因為「誠得其道矣，器雖不具變而通之可也」。

汪縉的「準孟」一文和上述俞長城「王霸辨」一文論點十分類似，都是肯定三代的王道，但主張不必恢復三代的封建、井田等制，反對實施封建、井田的言論在《文編》中十分普遍，例如：

梨洲則必欲復封建、井田，此則童孺皆知其不可矣。（程晉芳，二，十一下）

梨洲……以爲不封建，不井田，則世不可治，此則迂生習見，不宜出於學人之口，烏有經天緯地之才而不能達權通變者乎。（程晉芳，二，二下）

周官者周公致太平之書也，而後世多病其難行，以時勢不周，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官獻瑤，十，十七下）

王政必酌人情，權時變，井田封建不可復，勢也。（楊名時，三，十一下）

而最有系統地反對實行封建、井田制度的文章是劉鴻翹的「封建論」與「井田論」。在「封建論」中他認爲天下治亂的關鍵是天子是否能修德，在封建制度中須要有德的君主才能懷服天下，而郡縣制度則道德稍差之人也能有效的治理天下，三代以後天不生聖人，所以封建不能不廢：

上有修德之天子，封建治，郡縣亦治，然封建必德大乃治，郡縣德稍次亦治，其理易明也；上無修德之天子，封建亂，郡縣亦亂，然郡縣必大不德乃亂，封建德稍衰卽亂，其理易明也。故封建之天下，非堯舜禹湯文武之聖，不足以懷服；郡縣之天下，漢唐宋元明之英君懿辟，一人獨運於上，公卿大夫承流於下，民未嘗不獲安。天爲是雖不生堯舜禹湯文武，而天下已治矣，三代之後天不能常生堯舜禹湯文武，則不能不廢封建。（劉鴻翹，十一，六下）

最後他並駁斥三種錯誤的看法：

(1)有人認爲「中原之地，不郡縣不足以尊天子；邊陲之地，不封建不足以控四夷」。他則認爲實行這種封建是倒授兵柄於人，國家強

盛的時候或許可以抵禦外侮，國家衰微時則會導致起兵叛變。

(2)有人認為異姓不宜封建，同姓若行封建可收扶危定傾之助。他則認為同姓封建還是很危險，如晉代的八王之亂和明代的燕寧之禍就是前車之鑑。

(3)有人認為可採唐顏師古之策，「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居而治，可萬世無虞」。他則認為封國太小，有變亂時不足以藩衛天子，封王不賢却又有餘力可以禍害民生。

總之，不論中原或邊陲、異姓或同姓、大國或小國，封建制度皆不適宜恢復，這也顯示出他完全肯定當代實施的郡縣制度（雖然文中約略提到三代以後的君主都不是聖人，但他却認為郡縣制度最適合這些「德稍次」却不至「大不德」的天子）。

在「井田論」中劉氏認為，三代井田制度是在特殊的時空環境之下產生的，一方面當時土地狹小管理容易，另一方面彼此之間有親情維繫，故推行順利：

其所食之田，不過如今之村堡，民之力穡以奉其上，略如今富民之佃，而又大半世祿，高曾祖父與民相依為命，地狹則措理易周，情親則甘苦不忍以自私。

然而秦併天下之後環境改變，首先是土地範圍擴大，其次地方官與人民的關係變得疏遠，因此井田制度的實施十分困難。作者從施行的手續來考慮這個問題：

地既遼闊難周，令與民情又疏而不親，約一縣之衆不下數十萬戶，民之二十受田，六十還田者日可數百人，令之精神不足以給，必假手於吏胥，財多者得肥饒，財少者得磽薄，舞文弄法，訟獄繁興。

所以他的結論是「井田第可施於私土子民之世，封建廢，而井田斷不

能復矣！」

除此之外《文編》中並沒有其它的文章直接討論封建與郡縣，但是顧炎武的文章却間接地與此問題有關。顧炎武在「郡縣論」一文中攻擊郡縣制度造成君主專制、民生痛苦等缺失，力主「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實施的方法是給予地方官較大的權力，可以世襲官位並自辟僚屬。《文編》雖然沒有收錄顧氏「郡縣論」一文，但是地方分權思想却是融合在他整體思想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文編》全書收錄了九十八篇顧炎武的作品，當仔細閱讀其中屬於學術、治體部分的文章時，我們發現其中有些明顯地帶有地方分權的意味，例如：

後之人見周禮一書，設官之多，職事之密，以爲周之所以致治者如此，而不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之外，文王罔敢知也……求治之君，其可以爲天子而預銓曹之事哉？（顧炎武，八，三下）

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衆治之而刑措矣……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中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于閨門之內，而猶有不率教者，然後歸之士師，然則人君之所治者約矣！（顧炎武，八，五下）

夫惟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獨展疾者皆有所養矣，此所謂均無貧者，而財用有不足乎？（顧炎武八，五下）

上述這些看法中無疑地蘊含了以團結宗族爲基礎的地方分權的理想。此外，《文編》中也收錄了「清議」一文：

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君子有懷刑之懼，小人存恥格之風，教成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而民不犯。（顧炎武，八，九下）

官職之升沈，本於鄉評之與奪，其猶近古之風乎。（顧炎武，八，九下）

這種重視地方輿論的看法也與地方分權有些關聯。

綜合上面所述，從《文編》中學術、治體部分對封建與郡縣問題的討論，我們發現就政府組織形式而言，《文編》中的意見都肯定郡縣制度而反對實施封建制度。當時的經世思想家並沒有在現行體制之外另行設計一套新的政府組織，他們的目標無疑地是實現在「中央集權、官僚體制」的郡縣制度之中。但是如果就此推論他們完全肯定中央集權，則乃仍有不妥，從上述《文編》中所收錄的顧炎武文章我們隱約地發現反對過度中央集權並主張以宗族為基礎的地方分權的思想並沒有完全消失。

以上我們分別從歷史發展的整體趨勢、王霸之辨、封建郡縣之爭三方面探討《文編》學術、治體部分的歷史觀。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該書的思想不是確定而單一的觀念，而是一套較複雜的看法。在歷史發展的整體趨勢方面至少有下列五種不同的看法，三代史觀、承認三代的理想但肯定三代之後的成就、歷史循環論、對歷史階段的劃分較富彈性、道器合一的歷史觀等；其中以前二種看法最為普遍，三代史觀使思想家以完美而超越的理想批判現實世界；而修正之後的三代史觀則肯定三代以後的部分成就，並以之作為效法的楷模，而《文編》對管仲、諸葛亮、張居正的推崇尤其反映經世思想的特殊取向。《文編》一書的歷史觀亦反映在書中對「王霸之辨」和「封建郡縣之爭」等二個論題的態度之上。這二個論題一方面在討論歷史上曾經發生的事，另一方面則藉此而反省經世究竟要以王道為理想？還是以霸道為目標，而實現理想的方法是採行封建、井田等古制？還是維

持郡縣制度？《文編》各文在事實判斷層面，有較一致的看法，認為三代是王道，是實施封建、井田、學校等制度的理想時代；而三代以後是霸道，實施郡縣制度，在各方面有許多的缺陷。在價值判斷層面意見較分歧；對於王霸問題多數文章主張尊王黜霸，但也有一些文章認為霸道值得效法；對於封建郡縣之爭，絕大多數的文章主張實行郡縣，反對封建、井田；但也有一些意見肯定以宗族為基礎的地方分權思想。《文編》的歷史觀是上述複雜意見的結合。

三 明清經世思想與歷史觀：一個解釋架構的分析

根據以上對《文編》歷史觀的分析，我們發現依據對歷史的不同看法，可以將明清經世思想區分為二種理想型態（ideal type）。

第一種型態的經世思想主張「三代史觀」，將歷史清楚地區別為成功和失敗的兩個階段，在知識方面傾向以經學或理學為基礎，並認為從經典之中可以清楚地了解絕對的真理，或者成功時代的各種狀況；因此他們經世的目標是希望以絕對的真理徹底地改變當前的黑暗以返回三代的王道；而經世的方法則強調「通經致用」，主張實施封建、井田等古制，使政治上權力分散，社會上財富平均，這種型態的經世思想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較大，並要求以理想來提昇現實，故往往具有較強烈的批判精神，且對現實政權抱持著離心的態度。

第二種型態的經世思想在歷史觀方面主張三代是一個理想的黃金時代，但三代以後並非全為衰頹之世，而是有時成功，有時失敗；或者主張「道器合一」的歷史觀，認為歷史是一個客觀演變的趨勢，而演變的過程中即蘊含了道。在知識方面，他們傾向於以史學為基礎，重視時代的變化。這種主張逐步改良當前的情況，他們肯定三代以後

的一部分成就，並以之為改良的楷模，對於王霸問題，認為王霸不是性質的不同而是等級上的差異，因此傾向於承認霸道的價值。他們強調「史學經世」，主張實施郡縣制度，反對復古，並到某種程度認為財富不均是歷史中不可避免的現象。這種型態的經世思想，理想與現實的時空差距較小，往往傾向於肯定現實政權，缺乏強烈的批判精神。

上述兩種不同型態的經世思想與南宋熹和陳亮的辯論，亦即「理學」和「功利思想」的差異有密切的關係。南宋以後理學家多主張「三代史觀」，而注重外在事功的學者則偏向肯定三代以後的成就或主張「道器合一」。值得注意的是在經世傳統之內，這二種型態的看法，或消或長，但一直都並存。明清時代經世思想中歷史觀的變遷，主要是從偏向第一型態轉向偏向第二型態，而清中葉之後，今文學派興起，高倡「三世循環史觀」，以預言的方式推動變法，至康有為徹底推翻了「三代黃金時代」的歷史觀，可稱為第三型態。今文學派的歷史觀已有學者作過相當深入的分析，本文不擬細述。下面我們嘗試就第一型態轉向第二型態的變遷作一分析。

（一）第一種型態的經世思想

三代史觀在明末清初經世思想中十分普遍，明末經世由東林首開其風，東林學者中不乏強調三代和三代以後截然不同者，例如：

三代以下道術不明久矣，只節義一途尚在人倫內，然已多不合道者，至說道德即未免悠悠空曠，若功利辭章更夢想不到人倫地位，嗚呼！何不於知止求之。^⑧

三代而下，只是鄉愿一班人名利兼收，便宜受用，雖不犯手

^⑧ 黃宗羲，〈明儒學案〉（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卷五十九，頁八下，孫慎行語。

弑君弑父，而自爲志重，實埋下弑君弑父種子。^⑨

三代而上黑白自分，是非自明，故曰王道蕩蕩，王道平平，後世以是爲非，指醉爲醒，倒置已極。^⑩

從以上的引文可以發現三代和三代以後的區別在於道德與不道德，而東林經世思想的目的，正是以極高的道德標準，徹底改造當前不道德的世界，因此他們裁量人物，訾議時政，對亂政的宦官、奸臣作嚴厲的批評。然而東林經世思想中歷史觀的角色並不重要，他們所關心的主要還是本體工夫、心性善惡等問題。至明末清初的經世學者顧炎武、黃宗羲、陸世儀（一六一一～一六七二）等人，歷史觀成爲經世思想的重要支柱。

顧炎武思想中「三代」是理想的黃金時代，經世的目標是返回三代的王道，他一再強調「憫禮教之廢壞，而望之斟酌今古，以成一書，返百王之季俗，而躋之三代，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使得如才老者與之講習，以明六經之音，復三代之舊，亦豈其難」，「三代之治可以庶幾」。^⑪爲了返回三代的王道，顧氏主張「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其著眼點在於封建是「公天下」而郡縣則爲「專大私」：

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爲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類之，事事而制之……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⑫

但他也知道封建已成歷史的遺跡，不宜全面恢復，故主張「寓封建之

⑨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六十，頁二下，顧允成語。

⑩ 同上，頁六下，劉永澄語。

⑪ 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三年），頁六〇、一三二、十五。

⑫ 同上，「郡縣論」一，頁十二。

意於郡縣之中」，亦即仍維持郡縣的體制，但加強地方的力量以矯正過度中央集權的闕失。顧氏一方面強調三代的理想，主張部分地恢復封建，但另一方面也肯定三代以後的一些成就，例如他在《日知錄》卷十三認為秦會稽山刻石「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他也稱讚東漢初年風俗之美可比擬三代，這是顧氏歷史觀的另外一面。

黃宗羲的看法與顧炎武很類似，但對於君主專制的批評更為尖銳，在《明夷待訪錄》中，三代理想是黃宗羲批判當代政治的重要基礎：

余嘗疑孟子一治一亂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亂無治也。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嘗爲一己而立也；後之人主……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也，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三代以上）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爲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學校……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⑬

爲了實現三代的理想，黃宗羲主張仿效古代，實行封建、井田。他和顧炎武一樣採取封建、郡縣折衷的辦法，他主張在內地實施郡縣，而沿邊則行封建，在封建之地：

務令其錢糧兵馬內足自立，外足捍患，田賦、商稅，聽其徵收，以充戰守之用，一切政教張弛，不從中制，屬下官員，亦聽其自行辟召，然後名聞。^⑭

在土地政策方面，梨洲主張恢復三代井田之制，具體的方法是先統計

^⑬ 以上引文分別見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敍、「原法」、「學校」。

^⑭ 同上，「方鎮」。

全國的田土與戶口，平均之後每戶分給五十畝，其餘的土地則聽任富民佔據。^⑯

除了顧、黃之外，當時另一位聲名較不顯著的學者陸世儀也有十分類似的意見，陸世儀字道威，號桴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思辨錄》，該書依《大學》的方式設計，目次依序為小學、大學、立志、居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等類，其中治平類合計十一卷，佔全書一半的篇幅，分別討論天文、地理、河渠、兵法、封建、井田、學校等問題。在陸氏的思想中三代與三代之後截然不同，前者為絕對的成功，後者只是補偏救弊：

周公以來無善治，漢、唐、宋竭力經營，只做得補偏救弊，三代規模，全未夢見。^⑰

古人治天下以禮，今人治天下以法。^⑱

三代之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務躬行，各敦實行？庠序之中誦詩書、習禮樂而已，未嘗以口舌相角勝也。^⑲

三代下，但有能撥亂者，未有能致治者。^⑳

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以田產予百姓。^㉑

為實現三代的理想，他主張「以三代之治治天下」，三代之治是指封

⑯ 同上，「田制」。

⑰ 陸世儀，《思辨錄輯要》（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叢書集成初編，據正誼堂叢書排印），卷十二，頁一二二。

⑱ 同上。

⑲ 同上，卷一，頁八。

⑳ 同上，卷十二，頁一二二。

㉑ 同上，卷十九，頁一九一。

建、井田、學校：

封建、井田、學校是孟子一生大學問，即孔子富之教之意也，必如此，然後可以稱三代之治，然後可以爲王道，張子曰，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②1}

封建、井田、學校三者，致治之大綱，後世若欲平治道理，總不出此。^{②2}

陸氏對封建的構想與顧炎武類似，主張「去兩短、集兩長」的折衷辦法：

循今郡縣之制，復古諸侯之爵，重其事權，寬其防制，久其祿位，有封建之實，無封建之名，有封建之利，無封建之害。^{②3}此外他又主張實行井田制度，將田分爲三等，授予人民，「老則授之子，無子而不能勝者，以田歸官，六十歸田也」，並採輕徭薄賦與之配合，如此可返回三代盛世。

呂留良（一六二九～一六八二）的時代比上述三人略晚，但對時政的批評同樣的尖銳，他認爲三代時天下爲公，而秦漢以後君主皆自私自利視天下爲家產：

三代以上，聖人制產明倫，以及封建兵刑，許多佈置，雖織維久遠，無所不盡，都只爲天下後世人類區處個妥當，……自秦漢以後許多制度，其間亦未嘗無愛民澤物之良法，然經綸之本心，却純是一個自私自利，惟恐失却此家當，……此朱子謂，自漢以來二千餘年，二帝三王之道未嘗一日行於天下者是也。

爲實現公天下的理想可行封建，他認爲封建制度不但可以削弱君權，

^{②1} 同上，卷十八，頁一八三。

^{②2} 同上。

^{②3} 同上，頁一八四。

而且可以創造一個額外的政治空間，保障不為正統所容納的思想活動。^{②4}

上述所舉顧炎武、黃宗羲、陸世儀、呂晚村等人主要活動時間均在十七世紀，明末清初之際，我們發現各人的關懷點雖不盡相同，但在思想型態上却頗為類似，他們都認為三代是理想的黃金時代，而三代以後衰敗墮落，為返回三代的王道，唯有實行封建與井田，但他們也不是完全泥古不化，顧、黃、陸三人均考慮到封建、郡縣的利弊，而設計出封建、郡縣混合的理想政府。上述的想法不是特例，當時持類似看法的學者還有很多。但這一種要求全盤改革的經世思想在十八世紀以後却已逐漸消逝，《皇朝經世文編》所蒐集的汪縉（一七二五～一七九二）、程晉芳（一七一八～一七八四）、劉鴻翹（一七七九～一八四九）等人的文章羣起指責顧、黃的復古主張是迂腐難行。的確，在十八、十九世紀，清朝的統治趨於穩固時，士人的經世理想轉趨於在現存體制之下要求逐步改良，這時雖然還有部分學者談到三代和三代以後的區別，但已經少有人再規劃一套超越現實、全盤革新的理想政府。

（二）第二種型態的經世思想

明清時代視三代為黃金時代的看法普遍為士人所接受，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三代事跡過於渺茫，因此「不暇遠引」，轉而認為三代以後的部分成就亦值得效法；更有學者突破三代史觀，認為歷史是一個客觀發展的趨勢，其中道器並存。上述對歷史的看法，導引出一種與「三代史觀」之經世型態截然不同的經世主張。在明末清初可以幾

^{②4} 呂留良，〈四書講義〉，〇二十九。並參考熊秉真，「十七世紀中國政治思想中非傳統成份的分析」，《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十五期，上冊，民國七十五年六月，頁十三。

社諸子所編輯的《皇明經世文編》一書和王夫之的經世思想爲例，至清朝則可以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等人的思想來作說明。

《皇明經世文編》（以下簡稱《皇明》）編於明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編者是韓屬於幾社的陳子龍（一六〇八～一六四七）、徐孚遠（一五九九～一六六五）、宋徵璧（一六四三年進士，生卒待考）三人，全書網羅明洪武至天啓年間臣僚著作三千餘篇，檢討明末政治、社會、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問題。歸納該書的文章，可以了解他們對歷史的看法。首先書中稱美三代的話很多，認爲三代是黃金時代，但他們並不因此而貶薄三代以後的歷史，而是認爲三代以後有好有壞，秦隋不好，可以爲戒，漢唐很好，值得效法。尤其特殊的是書中對明初的成就大力推崇：

明興二百七十年，海內治平，駕周漂漢，賢才輩生。……祖宗立國，規模宏遠，先朝大臣，學術醇正。²⁵

明興二百七十有餘載，遐靈四暢，元氣周匝，才激風烈，所在瀰淪，蓋文治之隆於斯極矣！²⁶

三百年來名臣輩出，如嶽如河，如鸞如龍，所以謂謨於總章之上，諷議於簡策之下者，固已麟炳往古，灼乎來茲矣！²⁷但他們同時也感嘆晚近以來，慢慢出現了一些衰弱的現象：

祖宗朝允文允武之實政，廢爲薄書期會之虛文，意寓風刺抑重有憂矣！矧今日而憂特甚，南寇北奴日益滋大，乃文人柔

²⁵ 陳子龍等編，《皇明經世文編》（臺北：國聯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據明崇禎間平露堂刊本影印），冊一，頁一一九——一三三。

²⁶ 同上，頁三七。

²⁷ 同上，頁二一——二八。

弱，既已論卑氣塌，無當上旨，凡而咭哦誦記，自章句而外無聞焉！²⁸

歸納上述的看法，《皇明》對歷史發展趨勢的看法是：三代是理想的黃金時代，三代以後則有盛有衰，秦、晉等朝不好，漢、唐則表現甚佳，而明朝初年十分理想，可比擬三代，但明中葉至今又逐漸衰弱。因此《皇明》一書不像顧炎武、黃宗羲等人高唱復古，返回三代王道；他們反對是古非今，認為「高論百王，不如憲章當代」，主張「以昭代之人文，經昭代之國事」，而目的則在返回明初「詳明整肅」的富強盛世。²⁹

《皇明》對王霸之辨的看法，也反映出類似的態度，他們強調富強是王道的一部分，聖人也追求富強，並非空言仁義。同時霸術雖然不及王道，但在天下危急之時，尚可支撑一時，書中以醫者治病為喻，認為霸道是治標，王道是治本，然而在患者危急之時要先治標，等穩住病情之後再談治本，「治標亦醫家正道，非旁門邪術也」。³⁰

《皇明》對封建、井田等制度的看法與顧、黃等儒者的意見也不相同，他們反對實施封建、井田，認為這些古制不合時宜，勉強實施只會徒滋紛擾，更何況歷史上新莽復井田，宇文周復六官，都是「篤於師古」，但結果却無法挽救敗亡的命運；而漢襲秦法，唐因隋制，却能締造輝煌的盛世。因此《皇明》的理想是實現在郡縣制度之中。

《皇明》的歷史觀修正了「三代史觀」，但仍屬於傳統的範疇，明末另一位經世思想家王夫之則有較突出的想法。

²⁸ 同上，頁三八—三九。

²⁹ 同上，頁一三八、二七。並參考許淑玲，《幾社及其經世思想》，師大史研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五年。

³⁰ 同上，海瑞，「復歐陽栢菴掌科」，卷三〇九，頁三三八。

王夫之的歷史觀可以稱為「道器合一」或「理勢合一」的歷史觀，認為歷史是一個客觀發展的趨勢，事物發展的規律（道）是存在於一個個具體事物之中（器），從「理與勢」的角度來說，理指現象本身的規律性，勢則為必然的趨勢，他認為凡是「自然而然」的合理現象，則必然是一種無法抗拒的趨勢，而凡是順著必然趨勢而存在的現象，也就是合理的，理與勢基本上是統一而不可分割的。

從道器合一的觀點看歷史發展，他提出進化的歷史觀，痛斥三代是黃金時代的看法，認為唐虞三代無異於當時野蠻而落後的邊疆土司，「軒轅以前，其猶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猶禽獸乎……所謂饑則响响，飽則棄餘者，亦植立之獸而已矣」。^①他認為歷史是沿著由野蠻到文明的方向不斷前進的，隨著歷史的進步「風教日趨於畫一，而民生之困亦以少衰」，所以三代之時人無異於禽獸，春秋戰國稍有進步，秦以後改封建為郡縣，「生民之困少衰」，此後漢、唐、宋、明均為統一而強盛的朝代，而明代更是一個「財足自億，兵足自強，智足自名」的偉大民族國家。^②

由於歷史是一個客觀的演變過程，由野蠻進步到文明，因此他有「世殊道異」的看法，認為古代實施的制度不一定適合今日，政法制度應隨時代而變通；「事隨勢遷法必變」，「漢以後之天下」只能「以漢以後之法治之」。^③基於同樣的理由，他斷言封建、井田等制度不宜恢復，而郡縣制度是最理想的制度：

若井田、封建、鄉舉里選、寓兵於農……先儒有欲必行之者矣，襲周官之名迹，而適以成乎狄道者，宇文氏也。^④

^① 王夫之，《讀通鑑論》，外篇。

^②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十；《黃書》，宰制。

^③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五。

^④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末，「敍論四」。

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⑤

王夫之的看法打破了黃金古代的理想，他以較平實的態度觀察歷史的發展，並以平實的態度提出切合實際的改革主張。清中葉以後對歷史的看法與他較類似的是魏源，但兩人的看法仍有不同。

魏源的歷史觀較為複雜，他一方面有類似王夫之「道器合一」，並反對黃金古代的觀念，另一方又受今文學派三世論的影響有「太古、中古、末世」的歷史循環論。這二種不同的歷史觀在理論上是互斥的，但却並存於魏氏思想之中。

在魏氏晚年寫定的《默觚》之中他提到歷史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

故氣化無一息不變者也，其不變者道而已，勢則日變而不可復者也。^⑥

而這個變化的趨勢是朝向便民、利民：

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變可復，人情所不改變者，變則不可復。^⑦

他並以江流入海的比喻說明歷史的變化不可復返，「江河百源，一趨於海，反江河之水而復歸之山，得乎？」^⑧從這個觀點來看歷史的發展，他發現三代和三代以後的「天、地、人、物」皆有不同，三代時有些地方優於後代，而後代亦有部分成就優於三代。三代優於後代者如：

^⑤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一。

^⑥ 魏源，《魏源集》（臺北：鼎文書局，民國六十四年），頁四八。

^⑦ 同上。

^⑧ 同上。

三代以上之人才，由乎教化，三代以下之人才，乘乎氣運，乘氣運而生者，運盡則息，惟教化出之無窮。^{③9}

三代以上之天下，禮樂而已矣，三代以下之天下，賦役而已矣！^{④0}

此外如三代時先王本乎仁義，「及其衰也，仁義去而詐力獨存」；三代時「聖人以其勢、利、名公天下，身憂天下之憂而無天下之樂」，後世「以其勢、利、名私一身，窮天下之樂而不知憂天下之憂，故慢藏守之，而奸雄覬奪興焉。」^{④1}但魏源也提到「後世之事，勝於三代者三大端」，這三件事是：

文帝廢肉刑，三代酷而後世仁也；柳子非封建，三代私而後代公也；世族變爲貢舉，與封建之變爲郡縣何異？……其用人之制，則三代私而後世公也。^{④2}

由於他對時代變化的深刻體認，他認爲古今不同，不可以互相「繩」或「律」：

古乃有古，執古以繩今，是爲誣今，執今以律古是爲誣古，誣今不可以爲治，誣古不可以語學。^{④3}

任何措施都必須根據時勢而調整，所以他大膽地提出「變古愈盡，便民愈甚……履不必同，期於適足，治不必同，期於利民」，^{④4}同時他也反對恢復封建、井田等不合時宜的古制：

^{③9} 同上，頁六五。

^{④0} 同上，頁四二。

^{④1} 同上，頁四三、四四、六十。

^{④2} 同上，頁六十。可參考楊聯陞，「朝代間的比賽」，收入《國史探微》，頁五二。

^{④3} 同上，頁四八。

^{④4} 同上。

莊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風必不可復，徒使晉人糠粃禮法而禍世教；宋儒專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選舉必不可復，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術。君子之爲治也，無三代以上之心則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勢則必迂。^{④5}

他並以禮記中「五帝不襲禮，三王不沿樂」以及「禮，時爲大」的看法支持他的主張。

然而魏氏在一八四〇年左右所撰的《老子本義》一書中却提出太古、中古、末世三世說的歷史循環論，他認爲人類歷史自古以來氣化遞嬗，如寒暑交替，剛開始是由淳樸的太古，演變到「有弊救弊」的中古，再演變到「弊極而殲」的末世，而在末世的遞變過程中，又啓發了回復到淳樸太古之初的先機，如此交相循環。從歷史循環論所觀察到的歷史演變則是另一種面貌：

夫治始於黃帝，成於堯，備於三代，殲於秦；迨漢氣運再造，民脫水火，登衽席，亦不啻太古矣。^{④6}

三皇以後，秦以前，一氣運焉；漢以後，元以前，一氣運焉。^{④7}

他不但以氣運的觀點解釋中國歷史的發展，還以此說闡明中西歷史的轉變。^{④8}魏氏的歷史循環論源於今文學派，即董仲舒的「文質再復」說和何休的公羊三世論。

歷史循環論和視歷史爲一變遷過程的看法，似乎並存於魏氏思想

^{④5} 同上，頁四九。

^{④6} 魏源，「論老子」二，收入《魏源集》，頁二五八。

^{④7} 同上，頁四三。

^{④8} 參考王家儉師，「晚清公羊學的演變與政治改革運動」，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稿本），頁五二——五三。

之中，兩者如何配合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但無疑地均對魏氏經世思想產生影響。由於重視時代的變遷，並主張根據變遷而追求解決之道，魏氏於道光初年編輯上述的《皇朝經世文編》，在敍文中他提到：「昨日之曆，今日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適宜，時癥近，勢癥切」，因此他針對實際需要，選擇「本朝以來碩公、龐儒、俊士、畸民之言」，提供治世之參考。道光八年以後他又著手編輯《聖武記》，記載開國以來的武功，但其根本的目的是探究本朝盛衰之由，師法清初盛世，他在「聖武記敍」中明言：

記曰：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是以後聖師前聖，後王師前王，師前聖前王，莫近於我烈祖神宗矣！⁴⁹

他在鴉片戰後所撰《海國圖誌》，分析西洋各國地理情勢與國情，而歸結到以夷攻夷，師夷長技以制夷，探索西洋真實情形，而謀求應付之道。其中還是洋溢著「時異勢殊，因時而變」的精神。他的看法與提倡恢復三代封建、井田的經世思想截然異趣。

三世循環論與魏氏經世思想的關係似乎較不密切，因為歷史變遷是大勢所趨，人為的主觀力量是無法阻止的；但他又表示如果人能夠回復到「淳樸無欲的太古心」，復心可以凝道，進而控制情欲與氣勢，則能撥亂返正，回復到無為而治的太古淳樸之世。魏氏的《老子本義》即帶有以老子「淳樸之教」來挽救世運的經世熱忱。三世論的歷史觀在魏源之後，有一番波瀾壯闊的發展，到了康有為，掙脫了以循環論來解釋三世的舊轍，改套用習自嚴復的進化論，這時的三世成為「一進不復退的觀念」，康氏就在這種「歷史潮流」的鼓舞下，毅然推動變法維新。⁵⁰這一系列的發展，顯然不是魏源所能預料

⁴⁹ 《魏源集》，頁一六七。

⁵⁰ 見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頁一四四。

到的！

魏源的思想居於一個相當關鍵性的地位，從清季今文學的發展來看，他上承莊存與、孔屏森、劉逢祿，下開廖平、康有為、梁啟超；從經世文編的傳統來看，他接續明末陳子龍等人所編的《皇明經世文編》和乾隆年間《切問齋文鈔》的傳統，其後帶起二十餘種經世文編的編輯，影響可謂深遠。

從歷史觀的角度而言，今文學派三世論的看法不屬於本文所揭橥的兩種經世型態，而應歸諸第三類型，這種歷史觀成為戊戌變法的理論基礎，打破了長久以來視三代為黃金時代的看法，並弔詭地帶起民初古史辨運動，這個曲折的發展在王汎森先生的近著《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書中有相當深刻的分析，在此不擬細述。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當今文三世的觀念熱烈發展之際，上述第二類型的經世思想並未消沉，晚清二十餘種經世文編多數均基於第二類型的想法，他們肯定三代以後的成就值得效法，主張根據實勢，隨時變通，而變通的理論根據也是「禮，時為大」、「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或「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至於十七世紀所盛行的恢復井田、封建的言論已少有人再提起。在十九世紀與今文學派相抗衡的古文學派，其經世傳統也接近本文所謂的第二類型，以章炳麟為例，章氏認為歷史是一個客觀變遷的過程，善惡並進，他否認三代是黃金時代，認為三代固陋，而六經只是古代歷史的記載，因此他反對以一套高遠的理想徹底改造現實世界，認為遠古之道不宜實行於後代，任何的法律規章都應根據現實情況而追求適宜。由於他對歷史的客觀體認，故能肯定三代之後的成就值得效法，例如他讚美秦朝，並和《皇朝經世文編》的許多作者一樣佩服諸葛亮「循名責

實」、「開誠布公」的精神。⁵¹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對明清經世思想中歷史觀的變遷，有一初步的了解。大致而言，十七世紀的經世思想與「三代史觀」和主張恢復井田、封建的經世型態為主，當時的重要人物如顧炎武、黃宗羲、陸世儀、呂留良等人均持此種看法；但這時幾社諸子所編的《皇明經世文編》和王夫之的經世思想則偏向第二類型，他們認為應隨時勢而變通，反對實施封建、井田，並承認三代以後的成就值得效法。至十八、十九世紀，第一種類型的經世思想消沉，第二種類型的經世思想躍居主流；魏源和章炳麟的思想是很好的例子。而當第二類型經世思想興盛之際，今文學派的公羊三世論亦出現，從莊存與、孔廣森開始，至魏源、龔自珍、廖平、康有為而達到極盛。因此十九世紀以來，第二類型的歷史觀和第三類型的三世循環論並居經世思想中歷史觀的主流。

在上述的演變過程中，我們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皇朝經世文編》一書的地位，它一方面繼承了十七世紀第一類型的經世傳統，另一方面又已轉向第二類型，因此書中對於王霸問題，一方面肯定尊王黜霸，另一方面又認為霸道值得效法；對於封建、郡縣問題，一方面支持郡縣，反對封建、井田，另一方面又帶有地方分權思想，這種混合而複雜的思想型態，無寧是很自然的。

⁵¹ 有關章炳麟思想參考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及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一八六八～一九一九）〉。（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民國七十四年）。

四 結 論

改革現實世界往往需要在現實之上找到一個立足點，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常以歷史的潮流或西洋的事例為立足點，而傳統中國的經世學者則依靠天、道、經典、歷史（古）或祖制作為聲援。明清時代經世思想中，「歷史觀」是「經世」的重要支柱，它直接地影響到思想中目標的設定與手段的採行。在本文中我們從兩方面探討這個問題，第二節嘗試以《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分的史料，作靜態的內容分析，第三節之中我們則依據《文編》的史料，建構兩種以不同歷史觀為基礎的思想型態，再對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經世思想中歷史觀的變遷作一探討。

根據上述對《文編》史料的分析，我們發現鴉片戰爭之前經世思想家對歷史發展整體趨勢的看法，至少有五類不同的意見，除了大家所熟知的「三代史觀」之外，第二類意見修正了「三代史觀」，肯定三代之後的部分成就亦值得效法；第三類是歷史循環論；第四類對歷史階段的劃分較有彈性，不以三代和三代以後來作區別；第五類則認為歷史是一個客觀發展的趨勢，其中「道器合一」、「理勢並存」。就數量而言，第一類和第二類意見最多，而他們的看法又和王霸之辨和封建郡縣之爭等論題結合在一起，大致而言當時大多數知識份子都接受三代是理想的黃金時代，只是其中有一部分人強調三代以後不斷地衰弱，因此他們的目標是超越漢唐霸道、返回三代王道，而採取的方法則是三代的良法美意；另一部分的人則認為三代以後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值得效法，例如《文編》推崇管仲、諸葛亮、張居正等人，由此顯示他們到某種程度已肯定霸道的價值，認為可以先返回漢、

唐、宋、明的楷模，將來有機會再回到三代的王道。

在《文編》中編者將上述各種意見結合在一起，我們發現在編者的選擇排比之下，各文並非散漫而無凝聚，而是形成了一套複雜的看法。就事實判斷的層面而言，各文多同意三代是王道，是實施封建、井甲、學校等制度的理想時代；而三代以後是霸道，實施郡縣制度，在各方面有許多缺陷。在價值制斷方面意見較分歧，對於王霸問題多數文章主張尊王黜霸，但也有一些文章肯定霸道的價值；對於封建、郡縣問題，絕大多數的文章反對井田、封建，主張郡縣制度，但書中收錄顧炎武的文章却又顯示，以宗族為基礎的地方分權思想並沒有完全消失。《文編》思想是上述複雜意見的結合。

根據《文編》的史料，本文建構二種理想型，第一類型主張「三代史觀」的歷史兩層論，傾向於以三代的高遠理想徹底改造現實世界，為實現此理想他們主張完全或部分地恢復封建、井田等古制。第二類型則較強調時代的變遷，或者主張三代之後並非全為衰頹之世，而是有時成功，有時失敗；或者認為歷史是一個客觀演變的過程，其中蘊含了道；他們反對復古，肯定目前實施的郡縣制度，認為應針對實際狀況而作調整，而三代以後有許多成就足為楷模。以此二類理想型態來看十七至十九世紀的經世思想，我們發現十七世紀是以第一類型的經世思想為主，第二類型的經世思想不及前者興盛；至十八世紀以後第一類型的經世思想已逐漸消逝，隨著清朝統治的穩固，以三代理想徹底改造現實政治的想法逐漸成為空響，隨之而起的是肯定現存政權，但要求逐步調整的第二類型的經世思想，在上述演變過程中，我們看到士人的經世思想由離心轉為向心，由徹底改造轉為逐步改良，整個發展趨勢是走向平實，但在這同時，整體改革的氣魄和高度的批判精神亦隨之喪失。

十八世紀以後今文學派復興，出現了公羊三世論的歷史循環論，至十九世紀末葉的廖平、康有為而達頂盛，這種看法不屬於上述兩類型，本文稱為第三類型。十九世紀經世思想中的歷史觀，是第二類型和第三類型並盛的局面。

以上嘗試從歷史觀來看明清經世思想的變遷，我們必須承認這樣的觀察只是研究經世思想的一個角度。誠如前文所述，對某些經世學者而言，他們對歷史的看法不是那麼確定而清楚，有些時候他表示三代和三代以後有如山崖和深淵，但有時又會說出三代以後的某些事蹟可以直追三代，這種矛盾或不一致是思想史的常態，勉強將之歸諸任何設計好的理想型態是不適合的。此外，還有一些經世思想不重視歷史觀，若從心性論、宇宙論或知識論的角度，反而較易突顯其特色，從歷史觀來觀察就扞格不入了。這是本研究所有的限制。

清末以後隨著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視三代為黃金時代的想法已全然破滅，明清時代盛行的歷史觀也不再流行，知識份子依靠一套新的歷史觀，表達經世的熱忱，他們批評傳統士人將固陋的三代美化為理想的世界，然而對他們而言，西方或俄國似乎成為一個新的三代。歷史就像人生，事情的變化愈多，就愈變不出新的花樣。